

闻 一 多 颂

——纪念新编《闻一多全集》出版

李 尔 重

新编12卷本《闻一多全集》出版了。这是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花了10多年努力的结果。这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《闻一多全集》。

这是一桩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。因为，闻一多的骨头和鲁迅一样是最硬最硬的，是中华民族传下来的骨头，毫无奴颜媚气，为人处世坦率真诚，严以律己，热爱人民，勇担历史责任；不顾个人安危，面对权贵，猛斥邪恶；心存烈火，从容赴难。这种骨头，风格，志趣，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动力，万万少不得的。

出版不是目的，请大家读是目的。读，也不是目的。请大家向他学，继承他，像他那样把自己溶在历史之中，不惜一切，不顾一切地担起历史赋予的责任，如实地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，这才是目的。这是反腐倡廉，祛邪扶正，建设社会主义，保卫社会主义的必需。

一、从做人起步

人是动物，又区别于动物。谁都承认这简单的道理。人类进步发展了人类文化，同时也发展了兽类的野性。对于这一点的看法就有了分歧。其实也很简单：在动物界里，谁见过“坑赵率四十万”之类的事？谁见过帝国主义用焚人炉或毒气室集体杀人的事？谁见过用原子弹在广岛长崎一次杀人二十七万人的事？谁见过日寇南京大屠杀三十万人的事？谁见过富者一餐数万金，贫者倒毙荒野的事？人类创造了生产工具，发展了生产力，从而产生了阶级，随着现代化生产工具的发展，阶级的两极分化更深刻，不但表现在一国之内，而且发达国家的垄断财团广泛地制造了第三世界人民的贫困。

资本主义的出现，是人类的一大进步，同时，也把“人吃人”的惨境推到了极点。

近代史里的中国人一出生就碰到一个严峻的考验：在帝国主义侵略、封建势力横行的黑暗与曲折中，是挺身做人还是屈辱做鬼？闻一多也避不开这个。

闻一多出生于书香门第，少年时代便读了古书。他化解了《诗·小雅·何人斯》的“不愧于人，无畏于天”，《老子》的“圣人无常心……以百姓之心为心”，《尚书·五子之歌》的“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”，《孟子·尽心下》的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，15岁便有了对人生的看法：“名之大小久暂，常视其有益于一群之深浅高下以为之衡”，“一切独善其身之说，皆斯世之蠹贼也”。他化解了《论语》的“言必信，行心果”，“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”，《大戴礼记》曾子立事的“行必先人，言必后人”，1916年他就认为：“君子学以博爱为本，而体诸人群日用之间”，反对“徒言道义，而鲜实践”。1920年，他痛斥“夫天地者乃万物之逆旅”的观点，立志要改造世界！“我们的天

性,叫我们把这个世界改造成如花似锦的,所以我们遇着事,不论好坏,就研究,就批评,找出缺点,就改良。……没有这种天性,人不会从下等动物进化到现在地位……”。1921年,他力主“不随波逐流”,“不……做权威的奴隶”,“不屈服”,要“扬善伐恶”,认为不说不动的“三缄其口的”金人是“社会的蠹贼”。

1929年前,看着他是个诗人,但他不是长发、留须、酗酒、殉爱、狂妄无疆的忘记做人的诗人,在《红烛》里,他表示了要为做人,为改造世界不计利害得失而奋进的志趣:

红烛啊! /莫问收获,但问耕耘。

这与“蜡炬成灰泪始干”的厌颓感是完全不同的进取感。

他的《死水》,乍一看给人以淡漠、无味的呓语情调,实质是不顾肮脏地劈开丑恶的志趣。

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/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/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/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。

他的内心里望着腐败屈辱的国家,恨她,爱她,同时,也看到了在这个情境中自己的责任。他告诉自己:“静夜,我不能,不能受你的贿赂,谁希罕你这墙内方尺的和平”。实际上,他是寒冰掩盖着的火山。几十年后,他对朋友说了:“我是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……”

他是“新月派”的诗人,但不是自命清高、隔断人间烟火、闭门造天的“新月派”诗人;他曾是唯美主义者,他所认识的美不是丰乳玉腿之美,也不是自我欣赏之美,更不是朝云暮雨飘渺无踪之美,而是做人之美。1923年,他就说:“文学二字在我的观念里是个信仰……是个理想,非仅仅发泄我的情绪的一个工具”,“我要替人们 consciously 尽点力。我的诗若能有所补益于人类,那是我的无心的动作”,“我将趁此多做些爱国思乡的诗。这种作品若出于至性至情,价值甚高。恐怕比那些无病呻吟的情诗又高些”。1924年,他就认定:“诗人的天赋是‘爱’,爱他的祖国,爱他的人民。”

他要做的诗是爱国爱人民的诗,他要求的美是做人的美,爱国爱人民的美。

他从少年时起,继承了做人、爱国的正气,并矢志力行。他和鲁迅一样,为国家的腐败和受辱着急,要救她,为之彷徨、呐喊,到底还是弄不清楚怎样做才能救得她。他曾致力于国家主义的活动,到1933年,他自己做了自我批评:“‘五四’以后不久,我出洋,还是关心国事,我提倡 nationalism,不过那是感情上的。我并不懂政治,也不懂三民主义”。在1944年前,他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国学的研究上去了,这不是丢开爱国,而是为了从旧精神上求解放:“我的读中国书是戳破它的疮疤,揭穿它的黑暗,而不是去捧他”。宋、明、清陆续地展开了考据训诂之学,再加上晚清发现了甲骨文,一批学者对于两千年来的典籍,提出了许多可信的辩驳,也只是给儒家道统洗了个澡,对孔孟的“克己复礼之谓仁”、“仁者爱人”,“忠恕之道”的根本思想,还没有做出科学的分析。考据训诂家的前辈努力可以说做到了传统的突破;而闻一多先生的研究是站在普通一民的立场上做了观察,做出了“关于儒、道、土匪”的论断,断定了孔子学说是维护奴隶制的学说,重新认识了老、庄、诗、书、易、管、晏等书的实质,也许容有不周之处,但可以肯定,他的研究成果,和郭沫若一样,是时代的突破。

他致力于国学,不是抛开政治,但他还“不懂政治”,所以,他也就不懂如何做个现代人。他与鲁迅一样为了救国下定了同样的决心,鲁迅说出了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,闻一多说出了“为了民族的永生,我们不能再吝惜我们最宝贵的血”。1933年,他就为爱国勇士们祝福:“看见你们为着争一个理想而赢来的遍体鳞伤……我祝福你们……”

从此,他坚决要做中国人。

二、做中国人

在太平盛世,有吃有穿,做个中国人可能比较容易。在帝国主义侵略、封建势力横行的日子里,做个名符其实的中国人则是很不容易的。在今天,帝国主义肆其武装威胁、经济制裁、和平演变之能事,虽在社会主义蒸蒸日上之中,加上垃圾苍蝇的捣乱,做一个名符其实的中国人也是不容易的。

闻一多对国家民族负责,持有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精神,一开场,他就不是一位空头文学家。1923年,他就说:“我要时时刻刻想着我是中国人,我要作新诗,但是中国的新诗,我们不要做西洋人说中国话”,“我们的作品既不同于今日以前的旧艺术,也不同于中国以外的洋艺术”;1926年,他认为,爱国运动和文学复兴互为因果”,“这两种运动合起来便能互收效益,分开来定要两败俱伤”,“爱自由、爱正义、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……也要流在笔尖,流在纸上”。到1944年,他明白地肯定了:“做一个中国人比做一个艺术家更重要”,“写作的问题是一个做人的问题,人的火候到了,写出的东西自然是对的。”

闻一多做中国人的思想,也是一贯的。这是由于他忧国忧民的志气,涵养了他的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抗精神。国内的黑暗,他看到了;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,他也看到了。1922年,美国退回了庚子赔款,在中国办学,闻一多说:这是要“清华学生要受点美国化,当然,不是要变成美国人”,“据我个人观察,清华所代表的一点美国化所得来的结果是:……物质主义……经济、实验、平庸、肤浅、虚荣、浮躁、奢华——物质的昌盛,个人的发达”。他愤怒地喊起了:

On! raise up, return to us again, / And give us manners virtue. freedom. Power.

他这种强烈的中国人的心劲,有着他从美国当二等或三等公民时受到的侮辱给予的教育。有的留美学生曾受过美国警察这样的侮辱:

Are you Japanese. Chinese or Penis? / Are you youngkey. donkey. or monkey?

闻一多也不止一次地受过这类侮辱。1923年,他在一封家信中写着:“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,留居美国之滋味,非笔墨所能形容……年底我归家……当……痛苦流涕,以泄余之积愤。”在美国呆了三年,再也呆不下去了。在屈辱中,他懂得了“我与人是是与非的同义语”。对国内人要这样看,对外国人也要这样看;世界上只有具体的人,没有站在是与非之外的抽象超人。他渐渐看清了“帝国主义一手把着枪炮,一手提着钱袋,站在背后保镖”(给军阀、地主、官僚、汉奸、准汉奸做保镖——尔重注)。1922年,他将要赴美留学的时候,已经看穿了美帝利用庚子赔款为美国培养奴仆。他们嫌中国留学生“美国化”得不够,抱怨中国人“太不懂得美国,太没受着美国文化的好处”。闻一多承认要从美国学点有用的文化,“但不要变成美国人”,他讨厌“一个中国人穿着洋服,说着洋话,站在一群中国人里,俨然是一个洋人,但是走到一群洋人里,总是没有他们自己那样洋。……真是‘四不象’了”。学有用的文化,可以;学一身奴气,不可以。在他1925年7月回国时,船到了黄浦江口,他把“沾满洋奴气的”西服革履,一赌气都扔到了海里,深深地吸了一口中国大地上的空气,浑身轻快,挺身拔背,踏上了国土。

三、做一个现代中国人

没有“做人”、“做中国人”的思想和志气,做不成现代中国人;有了,也不一定做得成合格的现代中国人。洪秀全具备了上述两条件,捻军和义和团具备了上述两条件,康有为、梁启超具备了上述两条件,百余年来成千成万为救国献身的烈士们具备了上述两条件,但是他们都抱恨归

去了。做一个现代中国人不但要敢于担当做中国人、救中国的任务，而且要懂得在帝国主义横行的世界里走什么路，靠什么力量才能救中国，救出来的中国该是个什么样的中国。

闻一多继承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：持正气，做正人，爱国爱民，身体力行。他花了很大力气去作诗，想用诗救国：

请将你的脂膏/不息地流向人间/培出慰藉底花儿/结成快乐的果子/灰心流泪你的果/创造光明你的因。

——《红烛》

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，这只是“感情”的，不是“理智”的。后来，他渐渐地转向理智，下力要研究中国，一头钻进了故纸堆里，干了十几年考据训诂文字之学。他说过：“我爱中国……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……”，他便努力去研究它。他发现中国的典籍因为古文字的变化和“通、假、借”的习用，再加上错简和错写，“十之四五”都是需要大力澄清的；他也发现了由于儒家思想的长期居于统治地位，儒家思想又不断地与释、道、法、墨各家思想衍化，到宋明时代实际上已成了“儒表佛里的理学”。佛家主“空无”“虚无”，儒家主“无声无臭”（《诗经》）。“无方无体”，“无思也，无为也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”（《易经》）。“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”（《论语》）。“有若无，实若虚”（《曾子》）。这都可以作这儒、释、道相依相通的理论根据，中国文化中的许多糟粕也从而衍化出来。认识了这点，他下决心“戳破他的疮疤”，付出了巨大精力，看破了儒学的本质“是用来维持封建社会的假秩序的”。

虽如此，直到1937年，闻一多还没有放弃读书救国的思想，认为“一个学生的价值远高于一个兵士的价值”。1938年，他与学生退出长沙，向云南转移，步行四千余里，沿途观览风景古迹，写生作画，貌似悠闲，人民的疾苦与智慧却给了他前未有的震动。他听到了，看到了《西南采风录》里的民歌，发现了老百姓也会作诗，而且作得非常高明。“在都市街道上，一群群乡下人从你眼角滑过，你的印象是愚鲁、迟钝、畏缩，你万想不到他们每颗心里都自有一段骄傲”。他极其叹赏地抄录了几首民歌：

斯文滔滔讨人厌/庄稼粗汉爱死人/郎是庄稼老粗汉/不是白脸假斯文。
吃菜要吃白菜头/跟哥要跟大贼头/睡到半夜钢刀响/妹穿绞罗哥穿绸。

闻先生赞赏地说：“你说这是原始，是野蛮。对了，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。”“感谢上苍……几万万以‘睡到半夜钢刀响’为乐的‘庄稼老粗汉’，已经保证了我们不是‘天阉’。”闻先生摸了摸自己的良心，差可自慰地说：“还好，还好，四千年的文化，没有把我们都变成‘白脸斯文人’。”

他，主动地把自己摆在“白脸斯文人”之外，放在“庄稼老粗汉”之内了。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向“庄稼老粗汉”折腰，不能不说是世界观的转变。

从此，闻先生的思想急转直上，正确地认识了历史。“‘五四’运动也得到工人的赞助，这是‘五四’进步的一点证明，但是，工人并没领导地位，这是‘五四’民主运动不彻底的地方。”他认识了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的重要性。同时，他认识了：“只有广大的群众是主人，群众的利益定会战胜少数人的特权的”。“让文艺回到群众那里去，去为他们服务。”（《“五四”与中国新文艺》）

他正确地认识了历史的动力。“脱离了广大人民，知识分子不能挽救中国戏剧前途的危机，正如他们不能挽救中国政治前途的危机一样。”“《新中国》何以表现这样卓越？……很简单，认识了人民，熟习着人民……只要认识人民，每一个知识分子，都是一个可能的天才或英雄”。

闻先生从实践的正面与反面的体验中，“看清了我们这个民族，这文化的病症”，下决心从故纸堆中走向社会，摆脱所谓的“诗人”们的恶习：“只写自己所要写的，至于他的诗在社会上起了什么样的影响，他不过问。”“这是不负责任的宣传”。他决心从院墙的小圈子里走出来：“近来我在联大的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，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”，他要向田间学习，做“时代的鼓

手”。

四、他拆毁了象牙之塔

闻先生坐在象牙之塔里，过了多年“不懂政治”的生活，他与其他象牙之塔内的成员，有着很大的不同内涵。他一开始就是为救中国才筑象牙之塔的，幻想过作诗救国，读书救国。他是一位被冰层掩盖着的“没有爆发的火山”。历史急剧地前进，揭开了冰层的围幕，使他认识了“只有广大的群众是主人”。从此，他勇敢地跳进了社会，与历史的“主人”站在一起。

他认识了“新文学之所以新就是因为它是与思想、政治分不开的，假使脱了节就不是新的”。他看见自己在转身，虽然晚了些，也无可悔处。他欣赏王禹称的“磨”诗：

但存心里正/何愁眼下迟/得人轻借力/便是转身时。

这个“人”，在闻先生的心里当然是“人民”。有了人民的助力，可以阔步前进了。他不欣赏李白、方孝孺的赞美严子陵避世的钓台诗，倒是曾国藩走反动之路的务实态度，认为有可取处。曾国藩写下了这四句：

子为功名隐/我为功名来/羞见先生面/黄昏过钓台。

然而闻先生大为赞赏的还是轿夫们作的诗：

好个严子陵/可惜汉光武/子陵有钓台/光武无寸土。

他懂得，在历史上最后有天下的是人民。他认定：“个人主义的社会，只有个人，没有社会”，主张“社会属个人，个人为了社会”。可是摆在他面前的是四大家族巧取豪夺，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，他时时看到“在马路旁边的那些饿死的壮丁……那些捆着的、拉着、押着走的，一个个瘦成什么样子……走着走着就倒下……”闻先生越看越痛心，就感到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的责任重大，愤怒了。

1944年7月2日，他怒吼“别人不叫我们闹，我们就是要闹。国家到了这步田地，我们不管，还有谁管？”1944年8月初，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召开时事座谈会，闻先生以戏弄的口吻，响亮地亮出了人民的声音：“刚才听到各位长官的话，才知道军事上也毫无办法……现在只有一条路——革命！”

他重新思考了1943年跟美国人的一次谈话。美国人夸口说：“战争几时开始，便几时完结。”美国人瞧不起国民党部队，认为只有他们美国一反攻，才能把日本打败。闻先生回答得很巧妙：“你们不是早已开始了么？没开始的只是我们。”闻先生指的中国人民还未大反攻。他当时在大后方看到的是：一面是成行的行尸倒毙，一面是红灯绿酒歌馆楼台，还有“琳琅满目”“盛况空前”的画展——“云烟满纸”的林泉丘壑，摆在“气韵生动”的仕女面前。闻先生深为感慨：“你能说这不是‘奸污’战争？……真实而纯洁的战争……我们还要用钟爱的心情端详它，抚摸它，用骄傲的嗓音讴歌它。”“原来某一类说不得的事实与画展是互为因果的，血腥与风雅是一而二、二而一罢了。”感叹到这里，他得出结论：

“艺术……已如思想和文学一样，它也有封建的与现代的，或复古的与前进的……之别。你若有良心、有魄力……学学人家的画家，也去当个随军记者，收拾点电网边和战壕里的‘烟云’回来，或就在任何后方，把那‘行尸’的行列速写下来，给我们认识认识点现实也好……”

在大后方，很难看到闻先生所要看的画、诗或其他艺术品，而那种“琳琅满目”“盛况空前”却是常见的。闻先生看透了社会上有那么一种不明白的“风雅阶级”，还在为手拿屠刀的人帮忙：“自命读书明理的风雅阶级，说得轻点，是被利用，重点你利用别人，反正你是逃不了责任

的。”

闻先生的话是责人，却是自视的结果。1944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逝世8周年时，他说出了这个心情。他肯定了“鲁迅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一位光辉伟大的人物。因为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留下了宝贵的遗产。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。”“他勇敢、坚决地做自己认为应做的事，在文化战线上打着大旗冲锋陷阵。”“他对帝国主义，对买办大亨，对当权人物，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。”于是他十分坦诚地说：

“现在我向鲁迅忏悔：鲁迅对，我们错了！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，我们都正在享福，当时我们如果有鲁迅那样的骨头，那怕只一点，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。”

“我们自命清高，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！”

我看着腐败透顶染满血腥的社会，时刻象“受刑一样”的痛苦，他说：“我们不能不管了！”他拆毁了罩在身上的象牙之塔。

五、进入涅槃境界

佛家的“涅槃”境界指的是大彻大悟，修行得道，无所苦恼，和“圆寂”、“灭度”、“寂灭”等异词同义。这种大彻大悟是“信、愿、行”的统一。闻一多的大彻大悟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相结合的结果。

读遍了12卷《闻一多全集》，也无法找出他读过哪些马克思主义的书，只在1945年1月所作《什么是儒家》一文中，他说读过伊里奇的《国家论》，很重视由无阶级的社会进入了有阶级的社会的历史变化。他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肯定：“儒家思想……是奴隶社会的产物，而它本身又是拥护奴隶社会的。”从而认识到：“最根本决定社会之发展的是阶级，有统治阶级，有被统治阶级。中国过去的文学史都抹煞了人民的立场，只讲统治阶级的文学，不讲被统治阶级的文学。”

什么是马克思主义？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点就在于对历史的阶级分析观点，鲁迅得到了这点之后，摆脱了“彷徨”、“呐喊”阶段，“许多以前认为纠缠不清的问题，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看就明白了。”闻一多得到了这一点，也豁然开朗了。

他懂得了国民党反动派说的“国家至上”的虚伪性，是欺骗人的。“今天的政府不给人民自由，是他不要人民，等到那一天，我们人民能以自力更生的方式起来了……我们可以骄傲地对他说：‘我们可以不靠你，你是要靠我们的呀！’那便是真正的民主。”闻先生要的是“人民民主”，要争取“人民的世纪”和“人民至上”的国家，他要摈弃“特权阶级用以巩固并扩大他们的特权的结构”式的国家。

他要创造历史的“主要阶段”（这四个字在闻先生手稿中特别注明是“社会主义”，在发表时被人家删掉了——尔重注）。他看清了那些高唱“国家至上”的反动派，“叫人民献出一切，紧缩腰带，拼了老命，捍卫了国家，自己却一无所得，连原有难足维持的生活的那点，都要丢光……”于是，“最不能安身的是奴隶农民，因为他们无处藏，他们就要起来积极地革命。”“拆下旧房屋梁，再按照新的计划盖造，使成为没有阶级，没有主奴关系的社会。”

他不但投入了人民行列，而且决心依靠人民的政党——共产党。他回忆了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时，他和他的许多朋友寄希望于国民党的情况，“高兴于当时国民党的起来”，26年过去了，闻先生明白了：“当你读今天的历史时，你一定会感到庆幸，今天有某某党”，大后方“政治腐化的结果……是不能推到抗战身上的。半个民主的中国不也在抗战么？而且抗得更多，人民却不饿饭（还不要忘记那本是中国最贫瘠的地区）”，“敌后民主的中国，这个民主的大本营……”

黑幕明了，人民力量之所在有了，奋斗的目标摆出了，领导人民斗争的可靠政党有了，剩下

的只是一个“干”字了。闻先生清醒地分析了战后的形势和任务。

“请注意，帝国主义突然退出，封建势力马上抬头，跟着人民的力量就将把它一把抓住，经过一番苦斗，终于将它打倒。”

1937年，闻先生曾认为“一个学生的价值远高于一个兵士的价值”，曾同意“好人不当兵”之说，现在他的看法变了，“为旁人的事卖自己的命，‘好人’当然不干……但是如果谁自己想当主人……他就不妨把它自己的家族变成子弟兵，而自己也得身先士卒，做个卖命的表率。”

1946年6月，一个朋友拿出一把家藏的泥金折扇，请闻先生题字，他用小篆写了《楚辞》中的两句话：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。”

这不是闻先生要行吟泽畔，是他心中火山的另一种表述形式。他心里早已想定了：“暴风雨已经来到，一场苦斗是不能避免的。”

“历史的法则”告诉我们：“真正的力量在人民”，“只有在一个合理的社会里，在一个没有人剥削人、人食人的社会里，知识才是一种武器……才有大用。”闻先生长叹之余认识了这些。再也不做“何妨一下楼主人”（在蒙自时，他住楼上苦苦读书研究，别人送他绰号——尔重注）了。他说：“什么学术，什么研究，抛开它们吧。我们要干、干、干……”他昂然挺立，操戈赴战了。

“为了民族的永生，我们不能再吝惜我们最宝贵的血。”

六、忘我的斗士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帝国主义投降，闻先生剃掉了他多年来蓄下的胡子，象是年轻了许多，孩子们看见他都高兴。说：“顶好！顶好！”孩子的天真、明亮的眼睛的光辉，照见了 he 实际上埋在心中的黑石块和围绕四周的暗云，他对着孩子笑着痛苦的笑。

过了没有多久，国民党的“劫收”使他看见了对金钱的巧取豪夺，更看见了对汉奸的纵容和对人民凌辱，他击鼓如雷，声如裂帛：“使汉奸合法化的，自己就是汉奸……人民的决心是要一网打尽的。”

他重新回忆了蒋介石的《中国之命运》，对照眼前的现实，气得发抖了：“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，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的想法么？……《中国之命运》公开向‘五四’运动宣战，是我无论如何受不了的。”正在他为人民民主奋战时，昆明的蒋介石反动派制造了“一二·一”惨案，大批军警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住处进攻，杀死4人，重伤11人，轻伤14人。在“一二·一”座谈会上，闻先生痛斥法西斯分子的卑鄙无耻：“这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日子……一般人称之为白色恐怖，‘一二·一’惨案的暴行，连白色恐怖的资格也不够，简直是黑气恐怖。”

“让未来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，再继续前进……直至……每一个反动派都战栗地倒下去！”

蒋介石的屠刀，蒋介石悬赏40万要闻先生的头，蒋介石的黑名单，都没有把闻先生吓倒。

“反正我们要记得，人兽是不两立的，而我们也深信，最后胜利必属于人。”

他一直地不舍昼夜战斗到1946年6月20日，次子立鹤，三子立鹏已乘班机飞渝，闻先生预定7月10日携家人飞渝转北平。6月26日至29日参加了民盟滇支部招待会，发表了明白坚毅的演讲：

“我们觉悟了昨天那种严守中立，不问不闻的超然态度，不是受人欺骗，便是自欺欺人。”

“这是一只洁白的手啊！然而也不可以太小看了它。当许许多多这样的手团结起来，它可以团结更多的手，无数拿锄头的手，开马达的手，打算盘的手，拉洋车的手乃至缝衣、煮饭、擦桌子的手……到那时，你自然会惊讶于这只手的神通，因为它终于扭转了历史，创造了奇迹。”

7月9日，闻先生不大舒服，卧小憩。特务装成的疯女人，在他的门上画了两个“夕”字，并吵吵嚷嚷，说先生命在旦夕，要他悔过。联大复员学生最后一批于11日离昆。

闻先生也该走了。

11日晚，李公朴遇刺。12日晨五时李公朴逝世于云大医院。

闻先生的病跑了，烘火的精神来了。他立刻赶到医院，久久地看着看着静穆的战友，扬起头来凝视的着远方，拿锄头的手，开马达的手，拉洋车的手，打算盘的手，如林的手，民主的大本营……他一字一字地说：“公朴没有死，公朴没有死！”

他忙着筹组李公朴的丧事和善后事宜，反动派一面制造谣言说李公朴是共产党杀死的，一面威胁说：闻一多是第二个李公朴。闻先生连日忙碌，夜暗给出了安静，他叼着烟斗思索着明天的事。一位把帽檐拉得低低的人进来了，摘下帽子，才知道是一位亲密的好友。

“逮捕名单十余人，包含民盟负责人及《民主》刊物负责人。这消息绝对可靠。您是不是……？”

“事已至此，我走开，何以慰死者，何以对工作？……”闻先生笑了，手把烟斗。

7月15日上午10时，李公朴治丧委员会在云南大学开会，特务们摆出了“乌云压城城欲摧”的架式，以闻先生为首的千人大阵摆出了“紫光照甲金鳞开”的威严。闻先生横眉冷对，气压万钧，声如霹雳：

“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，竟遭此毒手？他……所写的，所说的，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。为什么要打要杀，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打来杀，而偷偷摸摸的来暗杀！这成什么话？”

“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！你站出来，是好汉的站出来！你出来讲，凭什么杀死李先生？”

“告诉你们，我们的力量大得很！多得很！……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，真理是永远存在的。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！”

我们不怕死，我们有牺牲的精神，我们随时象李先生一样，前脚出大门，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！”

这就在这一天的下午五时，反动派用卑鄙无耻的无声手枪夺走了闻先生的生命。

闻先生于48岁牺牲了，人们悼念他，也惋惜他，认为他活着会对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。人们习惯于对牺牲的烈士的青春年华表示惋惜。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但这不是烈士们的思想。做为刘胡兰、黄继光、董存瑞，以及古往今来的创史烈士们的共同思想是：“生时坦荡，在革命需要的时候，视死如归。”

熟沫若对闻先生的牺牲，既有人们共有的心情，又有其卓越的见解：“正有充分资格来担当批判过去，创造将来的时候，却没有让他用笔来完成他的使命，而是用血来完成了……”

历史不是一个人，一代人或几代人所能完成的，而是无尽的人群和无尽的岁月，创造着无尽的史篇，“一个人倒下去，千万人跟上来”，这是历史的规律。在我们悼念闻先生时，切记他向鲁迅学习的态度：“学习他这种高尚的人格。”

革命的品格，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，永放光辉，永照史册，也永不停息对给人类以智慧与力量。这叫做永垂不朽，死而不亡。

（本文原刊《中流》杂志1994年第10期，本刊转载略有修改）

（责任编辑 张炳焯）